

行道与守道：元至明初 文人人生态度的生成与转换

□ 左东岭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院 北京 100048

通观元代历史,尽管入仕之途狭窄而艰难,尽管入仕之后时常遭遇种种的委屈与烦恼,但真正抱定始终不肯入仕的志向而高蹈远引者依然是少数,宋濂主持的《元史》“隐逸传”仅收杜瑛、张特立、杜本、张枢、孙辙、吴定翁、何中、危复之、武格等九人,实在少得可怜。其中当然有特殊原因,像戴表元、谢翱、方凤等宋末元初之隐士被归入了宋代,而元末隐士戴良、丁鹤年、王逢等尚存活于世而不便入史,易代之际往往会出现庞大的隐士群体,如果未将这些人纳入视野,则其数量显然会大打折扣。但即使去除这些因素,有元一代仅收入九位隐逸之士,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其中需要注意的情况就是,元代士人或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或为道德理想的追求,游以求仕成为一时之潮流。真正通过游说干谒而获得入仕机会者实在少之又少。大多数元代中后期的文人均经过一个或游历干谒,或参加科举,而最终失意归隐的人生过程。

正是由于元代文人的归隐一般都是在出仕而不得后的无奈选择,所以大都饱含着一肚子的委屈与不平。当现实将其抛出政治格局之外后,其中具有儒家身份与理学背景者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守道”的角色,或著述以存道,或教书以传道,或修身以显道,或写诗作文以明道。元人将其称之为“儒隐”,“学而不仕”乃是隐儒的关键要素。此类隐儒是元代一种流行的文人身份,由于宋代理学的流行及儒学的家族化,读书修身成为文人的身份认定,而宋亡之后,文人在新的社会格局中被普遍边缘化,“学而不仕”的现象便普遍存在,舒恭家族以“儒隐”来概括此种身份,可谓是准确的定位。隐儒之能够坚持自我的品格,关键就在于能够守住自我之志向而不为各种外在的诱惑与自我的欲望所影响,而守己也就是守道,没有道义的坚守,是很难守住自我的。只要“道明”才会“志定”,此乃儒隐之真义,也是元儒区别于其他朝代隐士的关键所在。在一个异质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守住传统的价值观念与

自我的人格尊严,那是应该引起后人足够的敬意的。从本文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因为这才是形成元代山林文学的价值依托与核心精神,也是构成山林文学思想和审美特征的关键要素。元代山林文学普遍崇尚一种高洁闲逸的体貌与境界,就与此种守道的精神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圣贤气象有直接的关联。

从元代文人的传统习惯来看,此时的文人群体依然可以用仕与隐两种类型予以区分。与前此不同的是,此刻仕与隐之内涵有所转换与变化而已。原来属于隐士群体的,此刻则纷纷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出山林而参与到各种政治势力之中,如宋濂、刘基、王祎、章溢、叶琛、刘仁本,等等。也有一些原本属于朝廷命官与地方官员的文人,在时局动荡中弃官而隐于山林,如杨维桢、恭师泰、恭性之、吴当、高则成、戴良,等等。由山林而被裹挟进各地方割据势力的文人,必须面临背叛朝廷与选择新主的压力与冒险。如果是投入张士诚或方国珍的政权怀抱,或许还有一丝心理安慰,因为这些政权毕竟名义上被元朝廷所招安,文人任其官职尚可视为服务于朝廷。而投入朱元璋或陈友谅这些原红巾军政权的文人,就必须为自己的政治选择找到合理的解释。元明之际的诗人刘彦炳经历了一个由维护元朝廷政权到投奔朱明王朝的转变过程,尤其是他还与坚守安庆而至死不降的余阙共事来往,更容易引起周围的议论。刘彦炳关于易代之际的问题还有更多的考虑。在他眼中,隐居山林是暂时的,是因为时机未到,一旦机遇降临,原来之“潜龙”即可变为宏图大展之“飞龙”。应该说,这并非刘彦炳一人之思,而是当时许多隐居者的共同想法。元明之际也有一批在朝官员走向山林而隐居,其原因复杂而多样。像杨维桢那样的名士类型的人物,乃是由于在元末官场遭受排挤陷害,最终转向了山林市井;恭师泰这一类朝廷重臣则是由于朝政混乱、地方动荡,从而无可奈何地处于亦官亦隐的状态;至于像戴良这样的所谓气节之士,则是

辗转于元末各方势力之间,最终未能找到符合自己理想的君主而选择了归隐山林。其中更多的还是不愿与朱明新朝合作而退隐。在明初以夏变夷的时代大潮中,戴良的“无道”谴责声音实在太微弱了,以致常常为历史所忽略。在元明之际的文人中,还有一个更大的逸民群体,他们对于新旧两朝均无兴趣,而是始终希望在山林中度过其观赏山水与吟诗作画的一生。在传统历史研究中,往往将此时的逸民与遗民混杂在一起予以讨论,以致模糊了他们的差异。隐居之士具有独立的人格与超然的情怀,他不会在意世俗的议论与评价,因为他知道,青山不老,松柏常在,环境强加于自身的所有讥评非议终会冰化雪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失去儒者的仁爱之心,当他看到听到村落中的“饥啼野哭”时,即使自身并未遭遇如此不幸,也会怜悯其痛苦而食不下咽。至于王朝的兴废与政治的纷争,那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尽管繁华终会散去,却不会改变人间的正道。

当大明王朝建立后,由于朝廷及各级政府缺员严重,亟须征召有才学者予以补充,这一大批隐逸士人也自然成为被征聘的对象。在此一过程中,无论是辞去征召隐居不出者还是迫不得已应召入仕者,他们的基本态度都是不愿进入官场的。不过他们的不愿合作并非对旧朝有所留恋或对新朝有所不满,而是由于长期闲散自由的隐逸生活使其难以再适应礼法的约束与案牍的枯燥无味。明初文人陈亮表示大明王朝已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他为此而欣慰,但却不愿介入以取富贵,而依然希望像陈抟那样做一个受皇上尊崇优待的隐士高人,悠游林下吟诗作文以歌颂新朝圣明。陈亮属于明初闽中十子之一,包括后来步入仕途的林鸿与高棅,均属于该文人群体。他们身处远离朝廷的福建,无论对旧朝新朝均抱着疏离之心态,宁可在山间林下度过余生。陈亮属于少数幸运者之一,他晚年在当地结“九老社”吟诗而终。但更多的隐逸之士却没有陈亮的幸运,他们被一次次的征召驱赶出山林而进入明初的官场,而且是去从事自己所不熟悉不喜爱的各种官差,不仅苦不堪言,而且饱受精神折磨。其中遭受打击面积最大的当属吴中文人,他们几乎都经历了入仕与贬谪的人生遭遇,有的还遭逢一贬再贬的不幸与苦难。即使像很早便投入朱明政权的浙东文人,也未能实现其行道的儒者理想。他们不仅要受到种种的皇权压迫,还遭致淮西武官集团的猜忌与陷害。由此,他们的为官经历从行道的初衷而变为颂圣的结果,并最终以集体性的覆灭终结了其历史的使命。

行道与守道,这是贯穿有元一代并一直到明代初期的士人群体所面临的两种选择,由于每个人的出身、经历及个性的不同,最终会做出或仕或隐的不同决定。但从元明之际易代前后情况看,其仕隐状

况则存在很大的差异。元代是入仕难而归隐易,明初是归隐难而入仕易。如果说元代士人在失去政治理想后还有一种坚守自我尊严的选择的话,明初士人则是连同选择的自由也一并失去。因为实现了统一大业的朱元璋有足够的理由与权威迫使士人以供新朝驱使,而不再留给他们隐居的空间。

朱元璋的理由当然很冠冕堂皇,为了百姓为了君主,而且还搬出儒家之孔孟先师作为榜样。然而,作为开国君主的朱元璋仅仅从政治角度去决定文人的仕隐问题,显然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因为它抽掉了士人最为看重的核心——儒家之道。看一看当时人苏伯衡对于仕隐内涵的论说,便明白君臣之间对于仕隐的理解差异有多么遥远。苏伯衡所言之道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君臣之道,也就是君臣关系的界定。那就是“君知之至然后起,礼之恭然后留,信之笃然后用”,相互之间的了解、尊敬与信任缺一不可,否则便不能出仕朝廷。第二是行道之内容,那便是“道德”与“仁义”,此乃出仕之内在依据,而不是朝廷所给予的官位与俸禄。如果能够满足上述两条谓之“道合”,否则谓之“道不合”,由此也就确立了出或处的前提条件。

这显然是元代文人长期形成的行道与守道的观念,并决定着他们的人生选择。宋濂在元末之所以未能接受朝廷的征聘而入仙华山为道士,显然是感到没有满足其君臣遇合之道。而后来之所以能够被朱元璋聘请出山,也是因为他认可了朱明政权不杀人的仁义之举和“为天下而屈四先生”的礼遇、信任及理解。有学者将元明之际文人的此种选择称之为“择主心态”,但其选择的前提便是是否有“道”。在大明王朝未建立前,朱元璋的确显示了有道之君的一面,因而也就网罗了更多的人才。然而遗憾的是,取得天下后的朱元璋不再认为君臣之间是合作关系,需要相互间的信任与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而是单方面要求文人的付出与服从。于是,朝廷与文人之间对仕隐内涵理解的相差越来越远,那么“俟焉而辞职,忽焉而拜官,暮而处,朝而出,屡进而屡退”的现象终于成为官场常态,则行道与守道均难以成为文人的现实选择,山林与台阁也就均难以成为士人的理想之地,元末文人所梦想的所谓君臣遇合也便随之付诸东流。历史就是如此的吊诡,元蒙朝廷的粗疏颓废使得文人的行道步履维艰而痛心疾首,却毕竟能够悠游林下以坚守自我的操守与承担文化传承的使命,当他们觉得驱逐鞑虏、再复汉统的大明王朝给了自己出仕行道的机会时,却遭致的是忧谗畏讥、动辄得咎的尴尬境遇,这不仅使他们的政治热情迅速减退、政治理想最终归于幻灭,同时也使他们复归大雅的文学理想成为泡影。

■ 《文史哲》2020年第2期,约19000字